

《花城》《青年作家》《广州文艺》《作品》:

书写技术变革现实里人们的期许

现代化如离弦之箭,作者们在过去与未来、真实与虚构之间逡巡,追问新的时代条件下人和文学的变化。近期新作是当下生活的切片,《花城》《青年作家》《广州文艺》《作品》中既有个体志向的表达、对文学本体的探求,也有对新技术革命、心理疾患、人口老龄化、婚恋家庭、亲密关系等话题的讨论。

当“虚构”成为写作的主题

在先验小说中,“虚构”自身就构成一个鲜明的主题,当下作家在此延长线上继续探讨自我和虚构的关系。鬼金《被虚构的人》(《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时常叩问“被虚构的感觉”从何而来,答案既指向混乱颠倒的外部世界,也指向虚脱的身体和空洞的内心。主人公意欲挣脱虚构,找回自我,但终究还是折返虚构,视其为避难所。思铸航《伪蔷薇刑》(《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的主人公深陷于生活的无意义感,选择用虚构来涂抹现实,直至二者水乳交融。小说揭示虚构虽是自救的行动,但也有自溺的危险。西伦《小说家之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中,小说家马萨掉进自己的故事里与笔下人物迎面人会面,在叙事迷官中追寻自我。作家们把迷惘、挫败等体验交付给繁复的技巧,通过虚构制造逃逸之路,织就意义之网。

因为广博的阅读量和娴熟的技巧,作家得以在虚构世界中辗转腾挪。王甜《书村奇遇》(《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是以《桃花源记》为底本展开的灵异故事,也是《狂人日记》的当代变体。王陌书《垣伯记》(《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从标题起就有意与《约伯记》发生互文,春秋时期出身没落士族的主人公涉归,有大志而无恒心,在经历了系列变化争端之后重回家门巷口。水鬼《古典夜生活》(《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由五个短小精悍的古代故事组成,涉及江湖侠客、小偷、工匠、书生等人,颇有古典志怪小说的风格。严彬在短篇《重《夏吕斯的爱》(《作品》2024年第3期)中以脚注的方式直接提醒读者,主人公是“从普鲁斯特小说中出走的人物”。不同的文化资源被挪用,转化到新的叙事中。

飞速发展的技术改变了生活世界,文学以何种“技巧”来回应“技术”,对作家来说是一大挑战。杨清霖《朱砂痣狂想曲》(《作品》2024年第3期)以罗马神话隐喻现代人物命运,以“朱砂痣”这一符号勾连起三个年轻人:穿梭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自恋者温如玉、有监视癖的结巴林乾良和对异性有控制欲的马山威。小说通过二男一女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折射信息时代里人们的生存处境。广宗《我们如此热爱飞跃》(《作品》2024年第4期)虚构了“后瘟疫时代”的作家、作品和评论,通过戏仿多种文体来展现文学以虚击实的能力。小说的主要部分是一份来自2096年的讲稿,其中“飞跃须要欲望与幻想助推”的论断与技术时代“何以为人”的问题紧密相关。曹畅洲《第一作者》(《花城》2024年第2期)讲述人工智能给艺术、法律等领域带来的冲击,回应技术进步论者的乐观设想。在未来世界,我们通过关键词搜索来自动生成文本,通过脑机接口来概览海量故事,文字媒介本身也面临合法性危机,这无疑“文学终结论”的回响。小说戏仿翻译腔和

新闻体裁,结尾处的一串小号字体显示阅读器的型号版本,直观地呈现技术变革给读写活动带来的影响。

现代病与文学想象

文学是勘探,是呈现,亦是疗愈。作家经由疾病叙事,观照人的身心状态。谢小灵《乡村医生》(《作品》2024年第3期)通过医生被愚众摧毁的遭遇,重写“吃人”主题。杨帆《倒下的人》(《花城》2024年第2期)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事,“我”以记者的身份记录脊椎病患者“你”的生活。但这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给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悼文:正值盛年却身体畸变,在重压下无法昂首生活,通过倒立“调整肉身,扭转乾坤”,最终丧生于一场洪灾。韩东《还你一颗心》(《花城》2024年第2期)从开精神病的假证明写起,最后揭开梁斌为白娅丽换肾的秘密。疾病勾连人事,是故事的重要枢纽,主人公将十数年的恩怨缩写为“他给我一个肾,却要我的心”。而更多的疾病叙事聚焦于心理或精神疾患,比如李少荪《隐》(《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中一场车祸后,母亲离世、女儿进入精神病院,叙述者抽丝剥茧,揭示家庭悲剧的元凶是冷漠的父亲和破碎的夫妻关系。余静如《世纪末的焰火》(《花城》2024年第2期)为抑郁症赋予“怀乡病”的涵义。主人公阿泽从市中心搬至郊区,将新居打造成童话王国,“仍要过孩子般的生活”;一次久违的家宴验证往日亲情难以维系,主人公在城市与乡村、童年与成年之间彷徨无地,在故事的结尾跑向记忆中的千禧年。李修文《木棉或鲑鱼》(《花城》2024年第2期)使用“重复”叙事营造疾病体验,身患抑郁症的于慧掉入梦魇,在幻觉中偶遇爱人/工人的幽灵,并一起实现阶级复仇。作者把病因溯源至国企改革,疾病由此获得了历史深度。小说技巧繁复,虚实相生,上述一切究竟是缘于疾病的臆想,还是欲说还休的历史创伤,交由读者自行定夺。

精致的虚构把疾病打造成社会隐喻和历史寓言,非虚构写作则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余冰如的散文《晚钟》(《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记录患有宫颈癌、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婆的最后时光。“我”和丈夫目睹疾病如何迅速摧毁老人的身心,在陪伴绝症患者的过程中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更新了对生死的认知。经由后辈视角,老年经验和养老经验一同浮出水面。在《“养老院院士”的日课夜课》(《作品》2024年第3期)中,老人不仅是书写对象,而且是书写主体。作者苏晨在94岁之前写下这篇回忆录性质的文章,以第一视角如实记录养老院的建筑、布局、活动、费用,在回望个人生命的同时,间或提及瘟疫的影响。生老病死是亘古不变的主题,而老年形象的凸显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相关,年龄和阶层、性别等因素一样值得关注。

对亲密关系的重建

婚恋家庭在当下依然是十分醒目的主题,作家选取不同的切口来解构爱情神话。徐晓《手腕》(《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围绕31岁211大学博士生安安的第10次相亲展开,对爱情的美好想象与残酷现实相互碰撞,凸显女性

的困境、城市外来者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格尼《谁是李莎丽》(《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启用双生子的寓言模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观得到戏剧化的呈现。李莎丽执着于琼瑶小说里“至死不渝”的纯洁爱情,用短暂的一生上演一出出爱情戏码;“我”以平稳为第一原则,完全服从现实考量,早早结婚生子。二人暗地里渴慕着对方的生活,作者则检视了两极选项。《气味》(《青年作家》2024年第3期)以嗅觉为切入点,讲述一个精神出轨的故事。已婚男子对M女士的气味着迷,发现她有交往对象时动了杀机,嗅到自己身上“如脓血般腥臭”的气味后落荒而逃。在上述书写里,爱情或凌空蹈虚,稍有不慎就被现实碾碎;或低如尘埃,卑琐苟且可被欲望套牢。

但作家们仍选择用情感来克服现实危机,在文学中纪念爱情、修缮婚姻、呼唤纯真。王一楨《恋情一种》(《作品》2024年第4期)中两位年轻人多思善感,双双选择自杀,但故事以两人灵魂相会的超现实情节作结,作家在笔端守护了纯粹的感情。方丽娜《留一个机场给你》(《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的主人公左婷意外邂逅昔日的老师兼爱人韩孝宗,展开对少年青春成长的回溯与反思。回忆并非简单的记忆复现,而是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她与往昔的自我和解,也宽宥了如今的丈夫。陈吉楚《重阳佳节》(《广州文艺》2024年第3期)讲述了祖孙三代人的创业史,家族企业创始人许北炬的“广州情结”与他的爱情期冀密不可分,爱情构成创业的情感动力。塞壬的散文《她的世界》(《广州文艺》2024年第4期)记录工人赵月梅的生活,赵月梅并未因爱情受挫就把自己指认为受害者,反而把“不计后果没有退路搭建整个生命的一场爱情”当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纯粹的燃烧”。娜然的散文《新村碎影》(《青年作家》2024年第4期)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成都太平南街新村度过的年少时光,怀念真挚的友情和一无所求的纯真爱情。

在典型的情爱之外,作者还选取其他切入点来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尹学芸擅长写真情和假意的混合态,《无事之城》(《花城》2024年第2期)中“闺蜜”之间互称花名(紫薇、百合、芙蓉、西番莲),她们是城市里彼此的陪伴,看似亲密无间,实则充满试探和防备。一位男性加入她们的共同体,西番莲遭其侵犯后诞下一子,而后卷款携子逃走。叙述语调兼具反讽和抒情,人物的背景、动机被叙述者部分隐藏,读者无法断定这一切是否由西番莲一手策划。友谊自有其花期,温情和算计相互缠绕。赵雨《流萤蜗牛》(《花城》2024年第2期)中的主人公“我”在租房期间遇见嬉皮女孩许佳仪,相似的家庭背景导致他们“在同个地方待的时间不能太长”。城市里充满偶然相遇和不告而别,两位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建立起短暂而亲密的联系,故事以“我”返乡、女孩搬家告终。在最后的抒情段落里,萤火虫在黑暗中起舞,这是二人情谊的唯一见证,也是作家和读者的会心时刻。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是变化无定的现实里人们的共同期许。

(本文为暨南大学明湖读书会的讨论成果,参与者为:刘志珍、曾嵘、林蓓珩、许哲焯、邱文博、邱雯意、张昀茜。曾嵘统稿,指导老师申霞艳)

■关注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给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了日趋多样化的精神生活选择。这一时代巨变折射在文学创作领域,即体现为波浪相逐的方法、观念更新,以及持续不断的题材开拓和风格探索。就当代文坛的情形看,相较于小说造境叙事的建筑感、诗歌缘情绮靡的音乐性、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设身处的临场氛围,散文的体裁形态和体裁气质显得格外驳杂、格外含混。它飘移在虚与实、幻与真之间,既比小说和诗歌平实,又不像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那么朴素。

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每每读到散文,尤其是一些单篇体量巨大的长篇小说,常会有恍如水滴于地的感觉,道貌岸然,泛滥无形,字词句段的思维似乎都已交代得明明白白,篇章架构的整体蕴含却很难清楚概括。像这样在文本面貌上和阅读感受中,都能够够小、诗歌、纪实和非虚构写作等兄弟体裁拉开显著距离的散文,恰恰在演绎和表征散文之为散文的那点特质。但限于种种条件,在文体流变的历史长河里,散文的这点亦虚亦实、半真半幻的特质直接表现的机会太少,被刻意掩盖或无意湮没的时候太多。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借着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和“新写实”“先锋派”这一连串排浪式的小说创作潮流的强劲冲击,加之风靡一时的“后朦胧诗”“探索戏剧”和报告文学方面大视野、深聚焦的全景纪实等文体试验的从旁带动,甚至还应该算上当时新引进的海外华语散文的侧面激发,散文创作的田间地头终于绽放了星星点点的新绿。其中,写作热情最为饱满,创作后劲也最为充足的30多位作者,清一色都出自各大高校园里的写作爱好者群体。在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毕业离校、走向社会之后多年,他们学生时代青涩的写作探索,才获得了文学史意义上的认定。分别于1991年、1993年和1995年出版的三本收录了他们代表性作品的散文集《上升》《九千只火鸟》《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以书名副题或编者说明的形式,把他们的创作成果标称为“新生代散文”。

而在《九千只火鸟》和《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两部文集里同样都有作品入选的是张锐锋。今天回望之下,当初的“新生代散文”作家群中,在坚持探索散文创作新出路的方向上走得最远、最执着,也最有耐心的一位,可能就是张锐锋。专注深耕散文创作之前,张锐锋曾一度风风火火地奔忙于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写作。青春意识的抒发,高加林、刘巧珍式的忧伤青春史的讲述,实地调查矿区生态灾难的危情警报,这些乘风破浪、多面出击的创作努力,应和了短暂的文坛时尚,也匹配了尚在积淀和定型过程因而还显得不那么沉着稳固的创作心理姿态。不过,这最终也成了张锐锋向随众从俗的那种诗歌、小说或纪实文学的写作姿态致敬告别的一场仪式。此后,主要精力投注到散文创作中的张锐锋,开始了步履和方向都独属于他个人的文体探索长征。

被张锐锋自述为“让隐匿的事物闪亮”和“从一个方向向内心窥探”的文体探索,没有拘滞于单打一的描写、叙事或思辨,更无靠选材猎奇、立论惊耸或摆设三五金句取胜。论作品的完整形态和句段的推进脉络,像《深的红》《记忆丘陵》《失乐园》《船头》《复仇的讲述》《迷境》这样的万字长文,都彻底挣脱了在单摆浮搁的记述、抒情和说理的三角阵里平面滑行的散文话语惯性,显现出精雕细琢、心游万仞的超迈气象和深切穿透力。在这里,冷峻绵密的观察和省思排除了个人情绪和情感的宣泄,细致入微的物象场景刻画代替了对号入座的社会历史背景设置,容易流于

从「新生代散文」到「新散文」

张锐锋的散文创作历程

李林荣

纤弱和局促的自我遭际忆述,让位给了面向自然幽深处和社会宽广处的凝视、谛听和畅思。与其说这些作品是散文,倒不如说它们是穿梭在散文和非散文之间、飞升在传统文学体裁格局之上的超体载书写。

《深的红》《记忆丘陵》《失乐园》环绕着怀旧忆旧这一散文写作的古老主题。只是张锐锋显然不甘心平铺直叙地堆砌自己对于故乡旧时人情风物的念想和记忆。为此,他选择了与这类散文寻常所用的从头上说起和如实地道来截然不同的做法,不但没有把触发文思的心理事件明摆在作品开头,当作醒目的招贴,反而对它们进行着意的后置、淡化和遮掩,使之成为悄悄涌动在流语文脉中的一缕隐形致密的暗流。如在《深的红》里,迟至尾声部分,才闪现了既是点题更是点明写作起因的语句:“我想到年轻的乡村画匠和在路边沉睡的老画匠,他们所画的农家炕围上的大红已经被时光剥夺了往日的鲜艳、灿烂,漆皮也已剥蚀,今天农民的新房也许已经舍弃了它。不过它曾经存在过,曾经和往事相互映照,它的意义已经被摆放在了无限宽广的时间里。”

《记忆丘陵》开篇征引的卡夫卡诗句仅具门面装饰功能,对于安徒生童话、埃舍尔绘画、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小说的勾连阐发,也仅起定调入题、营造语境和渲染氛围的作用。借此顺势带动起来的对于沉埋在于作者真实成长经验和乡邦史志传说深处的埠阳古镇历史人文的深描细画,才是全篇内容的真正吃重之处。而看似闲笔的“一个农民的孩子幸运地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和“一个年近半百的将军,从城市回到家乡,放弃了多少人追求的城市梦想,每天过着普通农民的日子”这两段未必需要坐实每一个细节的叙事,却对应着全文意蕴层面张力最为紧绷的一点悖论:被梦境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城市和乡村多向撕扯的生活,更多的时候是在碾压而非夯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世情常理。

《复仇的讲述》和《迷境》在张锐锋的散文中,可归为重释中国文化经典的专属一类。它们上承20多年前解读孔子的《别人的宫殿》,解读古汉字的《世界的形象》和解读古诗文的《河流:历史的五线谱》等几部文集,下接近两百万字的新著《古灵魂》长卷。究文体渊源,张锐锋述经典,可谓最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写作的立足根基和发端原点。但古老的文体基因和悠久的文体传统,也使得阐释经典的散文写作深陷在极强大而又极僵化的定势之中。对此,张锐锋施展的突围创新手法,正像他在写家乡、社会和自然人文历史题材的散文中所做的那样,主要是对小说、诗歌、戏剧和狭义的散文等各体裁领域积累的现成技巧,进行适配于素材本身的调度组合,以此激活并放大经典中的形象、情节和戏剧性元素,为诗意的哲思演绎和深邃的伦理驳辩搭建起生动可感、场面开阔的话语舞台。简言之,这就是前文所称的超体载。

即便是外观形制上遵循了读书随笔和游记散文常规体例的《“黑暗中的笑声”》《先知的声音》《为上帝画像》《绝望的疗伤》《灵与肉的秘密叙事》和《仙山》《山影奔腾》《西厢札记》这些精短篇什,得力于超体载的构思策略和修辞艺术,也焕发了形象灵动、意趣盎然的鲜活神采。而跨入新世纪以来张锐锋的这一系列近作,仿佛又在证实:无论是三十多年前兴起的“新生代散文”,还是20余年前提倡的“新散文”,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洪流中,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快步前进的风采。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第一感受

《石头城》:房伟的短句法

□晏杰雄

近年来,房伟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是抗战题材书写,从中短篇小说《猎舌师》到最新长篇小说《石头城》,形成了“房氏风格”的体系性书写,表现为可靠的资料征引、丰盈的日常经验与丰盛的文学性,在同类写作中开出了一条专业加细描的新型路子。打开《石头城》,映入我眼帘的是书中密布的短句,形成文字线条与标点断白的参差之美,感到一种汪洋恣肆的文气绵绵不断地向前奔涌而去。

小说用短句开头:“我醒来时,听到院子里的鸟声嘈杂”,再依次写鸟、秋雨、白雨布、院中的树,各类短句以灵动身姿飘然登场,组合建构起那种怀旧与隐痛的氛围。又如写主人公出场:“翼丰逃学不止一次了。他喜欢在街头闲逛,看皮影,听听评书,吃各式点心。”用短小的动宾结构连成生活流的图景,映照出一个江南少年的生命力与和平生活的余裕。短句运用看似絮叨,实则节制而有力量,把日常生活器具与物性袒露得细致入微,把一个南京童子军抗日的故事讲得深细好看,把伟大的民族气节彰显得荡气回肠。在阅读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到《石头城》有一种风行水上挟裹一切的语言之势,在短句的密集向前流动中,小说的主题、生活材料、故事框架、人物塑造、精神气质、文学品质等自然而然呈现,并且完成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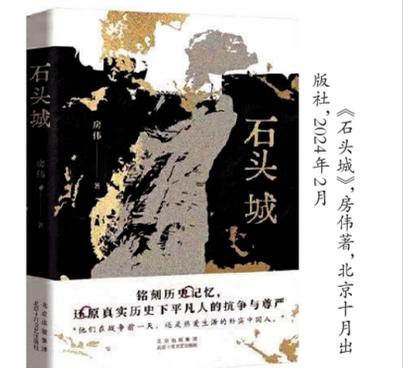
一方面,短句助力作者发挥专业素养。房伟具有良好的史料考证、梳理与甄别能力,能

使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史料更可靠,使历史材料能相应出现,基本做到大事不拘、小事有历史由来,有效实现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融合。历史材料是零碎纷乱的,隐秘的,相应短句就成了历史最好的象征,可让作者的专业素养得以充分发挥,以短小而细密的句式表现、归拢分散的史料,以春秋笔法传递历史隐晦的意味。如讲到蒋翼丰担任抗日童子军小队长时,有对第二届全国童军大露营召开、各省童军情况介绍、何应钦讲话等大历史资料的征引,也有童军随身器物绳子、热水瓶、英吉沙刀、军刺“毛奇”等的介绍,这些都是虚构不来的,需要作者有深入的史料收集与发掘,体现出从史料的缝隙中获取文学资源的专业能力。在短句的铺开中,大历史中人物、场景直接有力进入小说构成,如写何应钦:“一个胖胖的老男人,穿着童军服,登台讲话。”小历史细节则以名词罗列方式得到充分展现,童军诸多器物构成抗战活动一个个具体场域,成为刻骨铭心记忆,乃至多年以

后九十高句的蒋翼丰仍在收集它们,器具即心结,凝聚着民族屈辱与奋争。《石头城》既是建基于南京抗战史的大历史事件之上的,离不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也是一个不断构沉与还原个体家族史材料的过程,而短句能够提供文体助力,帮助作者专业而有效地征用历史资料,在大事件上保证史料的真实可靠,在个体生命叙述上表现历史的丰富性。另一方面,短句通向小说世界生活的丰盈性。如果说史料是《石头城》的基础或出发点,那么生活经验与文学性则是小说的题材发挥了,这方面,房伟的短句叙述更有驰骋空间。他绵密地使用短句,不动声色,不厌其烦,把江南生活的细节与神韵刻画到极致,从而把历史叙述沉入到日常生活肌理。细雨飞花似的短句,与日常生活书写匹配,天然契合精致的、温馨、优雅的、安稳的、扎实的、有品位的、有底蕴的江南日常生活。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说的美食描写,如翼丰嘴馋的零食、南京

早点四绝、蒋家的日常菜肴、玉楼春酒楼的名菜,以及食材选用、制作工艺与各种佐料,作者无不以短句进行了精心的描述,铺陈大量江南菜名,辅以描写口感的形容词。借用短句,房伟在小说中把人物五官的感受打开了,赋予了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的物性与质感。

此外,短句运用造就小说丰盛的文学性。从学者转向小说创作,其作品文学性往往令人质疑,但房伟是一个例外,已创作的一批作品均具有响当当的文学成色。除综合文学素养之处,短句体式极大成就了他,尤其在《石头城》有集大成体现。一是把南京抗战史的宏大叙事落到具体而微的描写句式。由于汉语短句不能贮存太多思想,必须有实际内容,《石头城》密集的短句铺排,构成了具体、丰盛的文学表述,不管写实质性短句,还是修辞性短句,都指向某个生活的实际或具体意涵;二是给予小说语言张力与弹性。《石头城》摒弃西方翻译体曲折而冗长的句子,采用短小精辟的句子,或把



《石头城》,房伟著,北京十月出版社,2024年2月

格物历史记忆
还原真实历史下平凡凡人的抗争与尊严
“他们在黑暗中前行,这是历史真实的中国。”

短句拆分,使每个句子具有完整性,句与句之间又留有空白,句断意连,余味丛生,较好保留了汉语言的弹性;三是赋予小说语言以典雅性。房伟自觉吸收中国传统文学营养,用宋词、小令方式写长篇小说,如“忍不住回头,见灯光摇曳,一个极瘦的女人的脸庞”,明晃化用“他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句。小说中,大部分短句自然蕴含汉语的美质,体现中国文学含蓄内敛气质,也使人想起我国古典白话小说与文章传统。短句,为房伟的创作营构了浓郁的文学性,也成就了她的华丽转身。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